



第一辑
寻找鲁迅

百端忧集有谁分

关于钱钟书的博学、智慧和幽默已被人说得太太多太滥，而钱钟书的精神世界却是一湖幽深的清水，坦然而深不可测。在钱先生辞世的时候，“钱学”的热浪已经烟消云散，也许是因为钱先生过于沉默的缘故吧。捧场的人终归发现自己是自找没趣。钱钟书并非是一个皓首穷经的古板书生，他识尽俗世中的许多花招和机关，却又含笑不语。他淡泊超然，却又悲天悯人。在参悟之后他不吝言语启发世人。

在物质时代，钱钟书这个名字古朴而神圣。在出版物铺天盖地，“克隆”文章满天飞的今天，钱钟书那字字珠玑的论著叫多少才子学者汗颜！钱钟书不是一个以玩弄文字为乐趣的人，他探幽入微、勾玄提要、谈典论故、微言大义，目的并不在考证和征引本身，他讨厌那些“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的“抄书当作诗”的虚假文风。钱先生对于文坛上的作态和虚美看得十分透彻，所以他本人总是拒绝恭维。钱钟书轻轻用笔尖一挑，伪装的面孔顿时脱落。钱钟书的为人和文章没有一丝矫揉造作的痕迹，他对社会人生的洞察缘于他对人生真谛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他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大多数人把精力和心智花在维护名义上面，浮在生活的表层，既蒙蔽了他人，又糊弄了自己。作为一介文人，如果应和了陈词滥调，虽然会获得名利和虚荣，但也遮蔽了心灵，埋葬了真诚。钱钟书认

为：“声名之起，乃缘才能，然才名不称又复常事。”在这个名不副实的泡沫文化时代，何必招摇过市、四处张扬，惟恐天下人不知呢？真正的文化人眼是冷的，心是热的，他不动声色，却又用心思考。有人说钱钟书是现代隐士，这种说法是肤浅的，钱钟书非常清楚那些妆点山林的隐士的鬼把戏，也明白阿谀拍马者惯用的公式。他喜欢疾恶直言的嵇康而反感“口不议人过”的阮籍。细读他的《管锥编》，我们会从中发现不少愤世嫉俗的话语，他不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无动于衷的闲适文人。记得有人曾拿鲁迅来与钱钟书相比，贬后者为“过于聪明”；现在又有人把王小波与钱钟书相提并论，以标榜某种他们所看重的趣味和癖好。这些比较都是生硬而牵强附会的，他们缺乏对钱钟书精神世界的了解，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因悲世和性格郁闷而自戕的文学博士胡河清在生前的学术研究中从生命体验的角度切入钱钟书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对被研究者的生命状态缺乏深刻感悟的“钱学”是庸俗浅薄的。钱钟书的幽默是悟透人生之后的揶揄和自慰，他决不是以说笑逗趣为目的。钱钟书具有浓厚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凉的心态首先是缘于生存困境的压迫。在《谈艺录》序言中，钱先生描述了自己蛰居在上海沦陷区时“兵罅偷生”、“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绝境，在这种状态下做学问，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学术操作。在《围城》序言中，钱钟书提到“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可见，钱先生在写那些令人笑破肚皮的绝妙语句时，心情并不轻松。他那种“锱铢积累”的痛苦写作境界决非时下以“码字”为特长的“侃爷”所能比拟其次，钱钟书的悲凉心态与他自身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钱钟书幼时爱玩一种叫“石屋里的和尚”的游戏，即一个人盘腿坐在帐子里面自言自语，杨绛女士认为这是钱氏“痴气”的表现，胡河清以此来阐释钱钟书身上所具有的老庄气息。其实，钱钟书并不想

扮演有匡世之略的“大隐”角色，他认为道家所言的“圣”境，实质是“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而人与天地合德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硬要这样做不过是“画虎刻鹄”而已。所以方鸿渐最终也未能脱俗，钱钟书在《围城》结尾设置的那只慢了 5 个钟头的祖传老钟象征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的冲突。“围城”心态不仅表现在婚姻问题上，它是一个古老的预言，纠缠着世人。钱钟书的悲凉还来自于他对人类的精神痛苦的关注，痛苦是人类最丰富的精神资源，没有经过痛苦体验的油滑表达不过是小花脸的假充幽默而已。钱钟书认为，人们的愁苦“变相别致”，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当“言之而须长言之”。只有深味人间愁苦的人，才能够写出真诚的文字来。钱先生在谈《楚辞》的时候说：“情思不特纠结而难分解，且可组结而成文章。”在提及李商隐《夕阳楼》中“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的诗句时，钱先生已不能自己，发出“尤堪为危涕坠心者矣”的感叹。

钱钟书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乙酉元旦》）表达了内心的忧伤和痛苦。而今，大师已经悄然远去了，他的情思大概已无人可解，而他那化石般的文字将永远敲打着追思者的心灵。

寻找鲁迅

现在，读鲁迅的传记有一个比较平淡的语境，革命与启蒙的热浪都已经远去，大家自由思考，随便发言，众声喧哗。这个时候，再来重新认识鲁迅，似乎没有太多的功利干扰。现代人眼中的鲁迅，重新理解和阐释的成分比较多，其中有读神者的反叛，也有庸俗者的炒作，也有理想主义者的捍卫与追寻。鲁迅与我们的联系，不再单纯是政治的、学术的界定，更有心灵的、情感的融合。鲁迅自称他是吃狼奶长大的，他常常“碰壁”，也常常绝望，然而深刻的洞察与灼热的批判使他能够从痛苦的边缘返回来，反戈一击。鲁迅丝毫没有把自己神圣化、经典化的意图，后来人这样做，是误读也好，是歪曲也好，是升华也好，是发挥也好，大都与鲁迅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前，利用“鲁迅”这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来做文章，无论他的模仿、他的抬举、他的崇拜看起来是何等的真诚，都难以清除其身上趋炎附势的味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别一种时文滋生繁衍，消遣的、逗趣的、关注私人生活的、渲染隐私的……这些热闹的文字在充当“文化快餐”的时候，也改变着现代人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于是，有人惊呼：不该忘却鲁迅。然而问题是，不该忘却的是哪一个鲁迅？

在读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的时候，读书界出版了《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被亵渎的鲁迅》以及周作人的《关于鲁迅》等，正好为人们真切地感知鲁迅提供了背景资料。林贤治没有把鲁迅传

写成一部思想传奇，也没有写成一部富有许多秘闻和错综复杂关系的野史。林贤治用平民的眼光打量鲁迅，寻找鲁迅。鲁迅是一个为老百姓的温饱和生存尊严而奔走和呐喊的思想界战士。鲁迅是一个关注“小题目”的人，不管“立人”的任务何等紧迫、何等重要，都必须得填饱肚皮，否则，启蒙就是一句空话，正所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许会有一顿两顿饱饭，但须看主子的眼色，须唯唯诺诺，须把思想和尊严交给人家来奴役，最终也无法逃脱“做奴隶而不得”的下场。

把鲁迅定位于“人间”，一方面可以提醒自己从神化鲁迅的误区中走出来，冷却神话制造者的角色迷恋，从“人间”的视角来追问、来寻觅；另一方面，是恢复鲁迅的“人间”本色，鲁迅是一个具有浓厚人间情怀的“地之子”，闰土怯生生的一声“老爷”曾让鲁迅震颤和悲凉，他从闰土的灰色眼神中看到了生命力量的萎缩。鲁迅是关注民生的，他说：“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引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鲁迅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对民生的关怀上，他不但关心百姓的衣食，更关注他们的灵魂世界。直面人生，除了勇于面对那不知来自何处的冷箭外，还要面对民众，面对他们的麻木、他们的奴性。

在鲁迅冷峻的话语里面，“中国人”是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人”是一个文化价值符号，它的后面蕴含着顽固不化的传统恶习，有油滑和小聪明，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有残酷的“人血馒头”交易。鲁迅之所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因为他对国民的灵魂有着切肤的体察。在强大的文化惰性和僵硬的国民“劣根性”面前，许多文人搞起了闲适文字，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绕道而行向来是中国文人的生存策略。孤独的鲁迅用刻薄文字把启蒙精神深深地刻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面，他所发现的“吃人”二字惊

醒了多少青年人！鲁迅对思想启蒙没有抱过多地幻想，他认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在“出路”出现之前，鲁迅宁愿一个人承担“窃火者”的痛苦。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明知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由此可见，文本并非是考察鲁迅心路历程的惟一依据，在冷峻的语词和含泪的幽默中，鲁迅的精神世界在延伸。

寻找鲁迅，不能局限于文本，更要与历史文化、民族命运的追思联系起来，当然，也不能脱离鲁迅独特的思想情感世界。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鲁迅不仅是一个文本的存在，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的人生经历是一本厚实的大书，他的爱情、他的结交、他的职业经历、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习惯等等都让我们从中悟出许多道理。例如，林贤治在书中提到了鲁迅先生不满无为的官吏生涯，鲁迅与官场上的排挤与谄媚是格格不入的，他最终放弃了“主流话语”，而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改造国民性”的世纪工程中。

我们其实一直被鲁迅阅读着，他并不想指一条现成的出路，在他之后，“真的猛士”继续呐喊，当然，也仍旧有彷徨的苦痛和“走了一圈又回来”的“老调子”。

只要“阿Q”还在做苟活的梦，“康大叔”还在搞“人血馒头”的交易，寻找鲁迅就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靠近鲁迅

大江健三郎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是一件让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幸好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出言谨慎，算是给了我们这个文学大国一个面子。令人意想不到的，在《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一书的序言中，大江先生居然毕恭毕敬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接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向鲁迅先生靠近，这一声呼唤出自异国作家之口，本身就是对中国作家的无形讽刺——眼下新潮作家大都在疏远鲁迅，他们把鲁迅当做一块硬石头，只有远远地绕过他，才不至于被绊倒。在这个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温和文人吃香的年代，人们认为与鲁迅保持一种距离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郜元宝先生在《鲁迅六讲》一书的自序中说：“世无鲁迅，天下太平，世有鲁迅，天下亦太平。”我认为这是一句富有禅意的话，郜先生不仅提醒吃鲁迅饭的研究者不要神化鲁迅，同时也暗示那些认为鲁迅碍事的人要有个数。只有靠近鲁迅，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才能够体味到一个博大灵魂的内在力量。鲁迅的世界是一个心灵场和语言场，他的磁力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消退。

郜元宝认为鲁迅的文学是和他的“心学”一同开始的，鲁迅讨厌那些空心的文学。在那个麻木的奴性十足的时代，“抚心愁叹”的青年鲁迅把文学当做“争天抗俗”的惟一手段。尽管五四时代孕

育了一大批叛逆者，但是，更多的出走者并没有继续孤独前行，不少人“走了一圈又回来”，应验了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的预言。鲁迅先生之所以没有昙花一现，不仅是因为他拒绝做“振臂一呼”的英雄，更是由于他所选择的对手是顽固和持久的。鲁迅从一开始就同“世道人心”过不去，他的目标是清除传统文化肌体中的毒素，所以，他从来都不把得罪人当回事。他当然清楚“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精神遗传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必须撕开面子，狠下心来“鉴别灵魂”。

鲁迅先生的批判力量来自他对“戏剧本能”的抵抗。鲁迅先生是一个体制外的独立思考者，他一方面拒绝“做戏”，另一方面又抵抗“看客”的角色。由此可见，靠近鲁迅，实质上就是靠近真实。鲁迅所提供给我们的决不是一堆花里胡哨的名词，鲁迅的语言是无法与内容本体相脱离的，他更关心骨子里的东西，他清楚：“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靠近鲁迅，不是为了“借光”，也不是为了充门面，而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一种精神血缘的凝聚。鲁迅先生正是怀着“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激情去观照国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遗传的。在一个麻木的时代，作为一个提前的醒來者，惟有具备自剖的勇气才能够承担疗救的使命。郜元宝认为，“抉心自食”始终是鲁迅作品的灵魂，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所缺乏的。要想靠近鲁迅，首要的任务就是拷问自己的灵魂，而不是逃避自我。

20世纪90年代，鲁迅峻厉的精神面孔被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人们用弗洛伊德和萨特等人的理论来阐释鲁迅的个性心理，其中隐含着不好说出口的结论就是，鲁迅这种激烈的表达方式已不适应于今天的语境。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比以往更懂得趋利避害，他们世事洞明却故作懵懂，顾左右而言他，人情的炼达使他们的文章失去了风骨，这是一种危险的成熟状态。鲁迅先生早已经看

透了这些“荃才小慧之徒”的把戏，他饱尝过“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所以，并不把所谓的“出路”看得很重，在很大程度上，他把“碰壁”当做了一种乐趣。一个不急于寻求目的和利益的人自然不会在乎各种恶语。无私才能无畏，鲁迅毕生都在消解话语霸权，且压根儿就不想以正宗自居。反抗是出于“深沉的自觉”，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靠近鲁迅，我们才能获得“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大境界。

郅元宝说：“鲁迅并不一味孤愤、沉重，更有轻松、幽默、欣慰和天真。与其说他是中国现代最痛苦的灵魂，不如说他是中国现代善于领略生命的大欢喜的一颗最充实的灵魂。”这无疑是《鲁迅六论》一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鲁迅的心灵痕迹被泡沫般的文字覆盖着，让我们用心靠近鲁迅，去寻觅生命中的那一段真实和洁白。

吃鲁迅饭

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是“吃鲁迅饭的”。王先生这么说，有几分自讽和调侃的意味，其中大约暗含着这样几层意思：一是，鲁迅这碗饭是不怎么好吃的，真正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人？二是，鲁迅这碗饭是不能白吃的，否则，对不起鲁迅先生；三是，既然吃的是鲁迅饭，就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岂能得了便宜再卖乖？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吃鲁迅饭的人就高人一头。鲁迅先生不愿意以“导师”自居，却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吃鲁迅饭的诸位学者和教授。这些动辄就把“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挂在口头的人有足够的耐心去转述鲁迅的一字一句。鲁迅的语言是很好用的，一句“痛打落水狗”就足以让“文革”小将学一辈子。被当做一种政治工具无疑是鲁迅的悲哀。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会真正的沉默下去。鲁迅先生代表着“无声的中国”中的一股否定的力量，他的声音让主子和奴才们都感到不自在。然而，让鲁迅想不到的是，更多的人仍旧习惯用闰土那种颤巍巍的声音称鲁迅先生为“老爷”。从中学语文课本的无限上纲到鲁迅研究专家的细微之处见精神，鲁迅成了一个现代神话。青年鲁迅曾经喊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口号，殊不知，迷信的影子一直纠缠着他。多少年了，人们始终迷信着鲁迅，痴心不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既然伟大领袖都把鲁迅先生称为现代孔夫子，

那么，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跑到“圣人”面前朝拜。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曾经引用过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悲哉鲁迅，多少“昏蛋”靠赞美你而上爬、发家，得到了不尽好处。

吃鲁迅饭的人不外乎三种。一种吃的是政治饭，拿鲁迅作跳板，跑到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上去。他们把鲁迅的话当成了红语录，借鲁迅来壮胆，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文革”时期，《鲁迅全集》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精神食粮。但是，他们却歪曲了鲁迅的精神，赋予鲁迅文本以暴力色彩。他们忘记了鲁迅先生说过：“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文革”中的广西等地方发生了“吃人”的惨剧，尤为让鲁迅先生寒心。由于失去了仁义道德的包裹，这血淋淋的“吃人”二字显得格外刺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一件无比畅快的事情。如同李逵一排斧砍去，为的就是“好不快活”。将鲁迅政治化的人实质上正是鲁迅的反面，鲁迅在专制面前从来都是“真的猛士”，拿鲁迅来打政治牌，是对鲁迅先生极大的亵渎。处在政治斗争圈子里的那些人其实对鲁迅的态度是不真诚的，他们只不过把鲁迅当做招牌而已。鲁迅先生早就揭了他们的老底：“招牌虽换，货色依旧。”

第二种人吃的是学术饭。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学科，供养了一大批学者、教授。他们靠炒鲁迅的冷饭评上了高级职称，当上了博导，享受到了特殊津贴之类。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们专在何处？大抵是多读了一些鲁迅的书和评鲁迅的书罢。鲁迅研究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在中文系那帮子老学究看来，鲁迅先生是一面镜子，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链条，只要附会上一些文学史料，就能够勾兑出不同味道的论文来。鲁迅先生是拒绝别人把自己当做本来研究的，他说：“我的思想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

请别人。”鲁迅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一大群道貌岸然的“鲁迅研究专家”不请自到。他们把在书斋里阐释鲁迅当做一种事业，一个饭碗。对于他们的学术成绩，我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么多学问家没有几个真正读懂了鲁迅的。那些东拼西凑、动辄洋洋万言的鲁迅研究论文，除了换得一顶贬值的硕士帽、博士帽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呢？也许他们最终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把鲁迅当饭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被称为“‘鲁迅式’的学者”的王瑶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鲁迅”显然不单单是一门知识，把“鲁迅”肢解成乱七八糟的学术零件，只会把鲁迅搞得面目全非，把鲜活的鲁迅精神变成死的东西。

第三种人吃的是表演饭。这些人有较高的表演才能，能够适应各种场合的演出。在政治时代，他们模仿鲁迅的战斗姿态惟妙惟肖，俨然是又一个“精神界战士”。进入“后现代”，他们又做出一副消解崇高的态势，显得很前卫，很“酷”。不论是赞美鲁迅，还是怀疑鲁迅，其实都是一种作秀而已。鲁迅先生早就知道这些见风使舵者的厉害。他发现，“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不料，鲁迅也难免被捧杀或棒杀的厄运。这些人没有什么立场，却精于观察风向，懂得如何迎合时代的口味。在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他们把鲁迅当做匕首和剑；在文化商品化的今天，他们则顺应大众的口味，搞点儿鲁迅与朱安、许广平、萧红等若干女性之间的“秘闻”，炒作一番。善于制造话题的王朔自然也不会放过鲁迅，否则，他拿什么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底层体验与文学理想

近来，底层体验与民间转向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在人文资源贫乏的商业时代，“自谋生路”的文人把民间话语当做新大陆，企图通过向民间靠拢获得解脱。时下知识分子重提民间转向与五四时期的民本思潮有很大不同，后者在“劳工神圣”的情感召唤中确立了人道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强调民间话语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视角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未必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改变。说白了，许多人是在把“底层”和“民间”当做幌子和招牌来加以利用。他们不断地以自身的“底层”记忆为资本来界定写作的性质，在“身份论”早已销声匿迹的今天，这种标榜是十分可笑的。一些作家不是以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和真切体验来布置文本，而是反复宣称：“我在农村吃了十几年的苦”、“我在黑暗、潮湿的矿洞里挖了许多年煤……”笔者对这种底层的经历怀有一种融崇敬、同情、难过为一体的复杂感情，但是，将写作的标准定位于民间并不等于精神资源的激活与丰富化。况且，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那些力倡“转向”的人并没有沉入底层的实质性准备。这不能不让我们瞪大眼睛。

泡沫文化的浮躁习气使文学成为飘在生活表层的一层油脂，特别是那些私人化、贵族化、城市化的文字，充满了庸俗无聊的趣味，“底层体验”被毫不怜惜地遗弃了。青年学者余杰发现：“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

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民间成为知识分子话语的真空。批判是一种选择，但批评者所提供的“民间”药方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民间话语作为一种资源本来就是一种潜在的、可供开发的东西，关注底层是一回事，直接地深入民间又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分子的本分与使命显然是前者。民间的东西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对象，如鲁迅先生毕生都在同民间话语搏斗，因为他最害怕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拥抱民间，化为民间一分子，启蒙则无从谈起，知识分子的品性也在无形中泯灭了。

过分地强调底层体验，就必然流露出一种矫情的成分。有的写作者以“关怀”为己任，时而诅咒商业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时而控诉大款们的为富不仁，时而又为官场腐败而捶胸顿足，这种激昂的声音确实让人感动，知识分子的良知依然“坚定”。但是，就是这些愤世嫉俗之士却一再表白要过一种无忧无虑、不愁吃喝的生活。原来他们所体验的“底层”只是别人的处境，并非是自己的真正位置。余杰拈出这样一个新名词：“体验的外向性”，按照余杰的解释就是：“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将别人的体验移植到自己的意识层面，这种体验只能是书面上的，停留在言说中。连茅盾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认为体验底层不是文学的全部，他说：“写乡村生活者必须熟知其所写的乡村，自不待言，但倘若他对于乡村以外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除了他所在的乡村以外，其他乡村的生活也大都茫然，那他对于所在这乡村的认识就不会完全，就不能深刻，那他即使能写得照相一般准确，也只是一幅死的风土画而已，只记录下表面的现象而已，不能表现动的人生，不能深入揭发这些现象下面的本质”（《茅盾论创作》）。可见，底层体验和民间话语有时会淹没文学理想，窒息思想活力。

传统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置于体制之外。无论是退隐、清谈还是充当幕僚，都是对社会体制的一种理解和参与。孔庆东对

知识分子喜欢高唱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他一再强调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性的障碍在于生存的艰难，并且声称这不是知识分子自身所能解决的。殊不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恰恰是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无法取得较多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比下岗职工要多得多，即使写不出作品的作家也照样能够在“作协”之类的机构领到一份工资，即使搞不出成果的科研人员也能凭老资格评上高级职称。他们自身缺乏抵御物质生活诱惑的能力，却又归咎于社会的商业化，用一些“逼良为娼”之类的话来表白自己的纯洁。如果把“独立性”当做一种姿态，无论如何表演，都不会令人自在。因为这种表演是依附于观众捧场的，他们难以忍受无人喝彩的寂寞场面，于是便指责这些观众无知、庸俗，惊呼“灵魂缺席了”。书斋里的“底层体验”究竟价值几何？苍生不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物，知识分子也不是日常生活的局外人，但是，知识分子的痛苦与受难显然与大众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否则，文学理想就难以张扬。让思想者匍匐前行，个人的精神高度就会降低，视野就会缩短。

用底层体验来克服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士大夫情结”，将知识背景与民间关怀联系起来，重新确立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系统是十分必要的。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作用下，在人文精神受到商业文化冲击的社会背景下，寻找扎实的话语根蒂不仅是一个话语立场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提升的文化创造过程。泛泛地提“底层体验”是容易的，而真正深入下去，将其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命归宿，这恐怕是余杰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生安于底层生活的老舍先生，把“无病无灾到公卿”的旧文人理想看做置文艺于死地的祸根。他说：“你要忘了个人的利益与幸福，你才能做一辈子文人，为文艺而生，为文艺而死。”可见，体验底层是一种升华，不是一种逃避，更不是放弃。